

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看经济发展理论的源流

谭 崇 台

一 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的兴起

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兴起于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以后二十余年,繁衍滋蔓,至七十年代中叶,已蔚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分枝。

它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的,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从殖民地、附属国走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般地取得了比较显著的发展。客观现实要求经济学家们作出说明和分析。

西方国家经济理论界中,一些激进派学者曾试图以他们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阐明经济发展问题,但是,他们的理论不够完整,力量比较单薄,个别有才华的学者如保罗·巴兰则不幸早年谢世,未能在理论上作出更多的贡献,从而远远不能形成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流。这一时期,西方经济理论讲台和论坛的统治力量,宏观方面是凯因斯主义,微观方面是新古典主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不仅以凯因斯主义的方法、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或两种方法的混合体分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问题,还从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封为“中心”,把发展中国家蔑视为“边缘”,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为骨架,分析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变动。一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以比较曲折的语言承认了这种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研究极力纳入西方学术轨道的情况,他说:“以1945年至1960年这段时期为高峰的非殖民化运动重新激发了对发展经济学的兴趣。许许多多的新独立国家和拉丁美洲比较古老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以追求国民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形势之下。富国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输出鼓励的利益以及大国势力的角逐,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兴趣。……国内和国际代理人期待经济学家们作出政策分析。由于不发达国家缺少经济学家,感受到这种冲击的是欧洲和北美。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不仅使之高兴也使之为难,因为他们差不多已好几代没有认真考虑过经济发展问题。这样,数以百计的迄今还只是国内问题专家的经济学者改头换面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而出现,成千的比他们前辈对政策问题更为敏感的年轻人为了把自己训练成为‘第二代’发展问题专家而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课堂。”^①

当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意味着国民经济有更多的产出,这些更多的产出,通常以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或它们二者的按人平均数值来衡量。而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产出的增加,还意味着随着产出数增加而出现的产出与投入的结构上的变化以及一般经济条件的变化。换言之,经济增长的意义较狭,一般指纯粹意义的生产增长,而经济发展的意义较广,一般包括经济结构、甚至某些制度上的变化在内的经济进步。但是,促成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是一切经济进步的首位的、必要的物质条件。第三世界中不少国家和地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由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经济

条件的制约和影响,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或“无发展的增长”之类的出乎预期的结果。但是,有发展而无增长一般却是不可能的,即使出现,也只能是短期的、局部的,而不可能是持续的、全面的。因此,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整个体系中,增长理论被看成是发展理论的组成部分,即使某些增长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为背景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延伸,但它们是可以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象的。例如,哈罗德—多马增长理论本来是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动态化和长期化,但所建立的模式: $\text{增长率} = \text{储蓄率} / \text{资本—产出比例}$,一般发展经济学家都对它十分重视,把它列入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篇章。不少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论著中或者把增长与发展并列;^②或者在似乎应当用“发展”一词的地方却用上了“增长”一词^③;或者明确地提出:“我们将互相代替地使用‘增长’和‘发展’两个词”^④。

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还有意把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研究一体化。如库兹涅茨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找出六个现象,把它们看作“规范化的事实”:第一,人口增长,但增长率不如资本存量之快,从而出现了“资本的深化”。第二,“资本的深化”意味着每单位劳动结合着更多的资本,从而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第三,劳动和资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大致相等。第四,资本的收益不变或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趋势性的变化。第五,资本——产出比率不变或至少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没有趋势性的变化。第六,储蓄率(或投资率)变动不大。尽管他也指出发展中国家今日所处的环境与条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前期也有所不同,但认为一些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如资本积累和人口发展却是一致的。罗斯托曾经提出过名噪一时的“成长阶段论”,他说:“我们可以按照社会的经济规模,把所有社会列入五类之一。这五类是: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迈向成熟阶段和高额大规模消费阶段。”^⑤又如刘易斯—费—拉尼斯的“无限剩余劳动”的发展模式,被认为不仅适用于当前的发展中国家,也适用过去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情况。按照这个模式,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农业部门中有大量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负数的剩余劳动。而工业部门有高于农业部门仅足糊口的工资水平的工资率,从而劳动有从农业移向工业的趋势,其结果工业部门的生产扩大,利润增加。利润转化为投资,这时,如果农业仍然存在着剩余劳动,则仅足糊口的工资水平依然如旧,工业的劳动市场由于有剩余劳动的源源供给,工资水平将不会提高。于是,利润量将继续增加,再可转化为投资。这个过程将循环无已,直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已全部被工业部门吸尽之后,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将提高,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提高。这时农业中的生产者的地位将有所改善,工农两个部门将得到均衡发展,从而二元结构的经济步入现代增长。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认为:在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总结构中,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是一个统一体,有关经济增长问题的思想,都是和经济发展问题有联系的,应当看成是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思想的组成部分。总之,我们所谓的经济发展理论,包括了经济增长理论在内。以这种认识为出发点,我们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史去探索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源流。

二 古典学派以前涉及发展问题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1. 重商主义

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产出的增长。产出的增长,也就是国民财富的增长。重商主义者的财富概念是极其狭隘的。在他们的心目中,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唯一代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坚持交换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

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⑥或如亚当·斯密所说：照重商主义者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⑦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社会财富的观点，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商业和国外贸易的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国内商业既不能从国外带回货币，也不能把货币带出国外。所以，除非国内商业的盛衰可以间接影响国外贸易的状况，它就决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或贫困。他们对国外贸易的重要性则十分强调，把它置于理论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

由此可见，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以产出增长为发展的物质动力的基本思想，在重商主义中是不见丝毫痕迹的。对这一点，一个西方经济学家说得还比较中肯：“重商主义是集中于供给的经济学。……尽管它全神贯注于供给，可是重商主义却不能生产它。”^⑧然而，尽管重商主义者的目的不同，但他们所倡导的保护幼稚工业、限制输入、鼓励输出等等政策措施，在今日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各个进展阶段中却得到再现。

2. 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透过流通过程，观察到生产过程是经济增长的泉源，还特别从物质形式去考察生产增长过程。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唯一真正泉源是农业，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重农学派还认为对外贸易不能产生社会财富。因为照他们看来，对外贸易不过是以一种具有出售价值的产品，去交换另一种价值相等的产品。

在当代发展经济理论中受到十分重视和普遍应用的投入产出法（它可以显示各个部门的产出和社会总产出，也可以显示影响发展过程的主要因素）显然是从重农主义者魁奈的经济表吸取了思想营养的。

重农学派认为来自农业的财富增殖可以保证人口的增长，而人口和财富的增长又促使农业发展，商业兴旺，工业扩大，从而社会财富不断地得到增值。这种循环周流、生生不息的经济增长观点，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基本的思想泉源。

三 古典学派涉及经济发展问题的思想

1.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无疑是把经济发展问题看作是进行分析的总的题目的第一个人。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包括了社会哲学、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几个方面。在政治经济学部分，他从实行分工的交换经济的基本结构关系，一直分析到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租税的准则。但是，正如书的标题所表明那样，焦点问题始终是经济发展，始终是什么因素促成国民财富的增加或减少。

斯密所谓的“财富”明显地具有“收入”或现代经济学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涵义。在经济思想史中，斯密最先提出了区别于总量生产概念的按人平均生产概念。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⑨这几句话把按人平均生产总产值的概念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斯密还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按人平均生产总值的两个因素。他说：“无论就哪一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成什么比例。”^⑩

斯密非常透彻地分析了农业部门在处于发展阶段的经济中的重大作用。在这一点，他承袭了一些重农学派的观点。例如，他同意重农学派的想法：基本的部门划分线在农业和非农业之间，而这两个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是极其重要的，斯密认为农业与工业的贸易条件有利于工业，因为工业生产者人数较少，容易勾结起来固定其产品价格，而且凭借其较大的政治势力，限制别人进入工业，征收竞争性进口货的关税，并采取其他不利于农业人口的种种措施。然而，斯密指出，就前一世纪的英国实际情况而言，毛布和其他重要工业品的“谷物价格”却是大大地下跌了，这说明了工业生产者的种种活动还是不足以扭转贸易条件日益不利的趋势。又例如，斯密也同意重农学派的农业优于其它部门的观点。他认为农业的资本——劳动比例比工业为低，而产出——劳动比例比工业为高。从而产出——资本比例也比工业为高。

斯密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资本的积累。照他看来，社会的真正储蓄者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的资本家。储蓄率的高低决定于收入中的利润份额和利润分解为储蓄与消费的比例。通过利润的再投资而得到的资本积累，是前面提到过的著名发展经济学家亚瑟·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供应”发展模式的基本论点，据刘易斯自称，他这个论点是斯密思想的“再生和发展”。二是资本的正确配置。资源配置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问题，也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特别是上卷第三篇第一章《论财富的自然发展》）中的一个中心课题。当然，斯密是从来不使用边际概念的。他只是从绝对意义来比较在不同部门间资本分布的有利或不利的情况。他认为：应当把资本倾注到最有利的部门，一直到“注满”为止，然后资本溢出，注入次有利的部门，又一直到“注满”为止，如此次第配置下去。

斯密对部门次序的排列基于一单位资本所雇佣的劳力。“最优的”部门是具有最高的劳动——资本比例，或最高的产出——资本比例（假定部门间不存在单位劳动的产出差异）。最能促进产出增加的资本配置，也就是最能促进资本积累的资本配置。根据这种观点，最佳的部门是农业；其次是制造业（在斯密时代，制造业差不多完全是手工生产，具有较高的劳动——资本比例）。而相对于使用的资本量来说只雇佣较少劳动的批发和零售商业的益处最小。斯密相信，这种基于社会利益的部门分级是符合于私人利益的。只要政府不作不明智的干涉，资本将由“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得到次序恰当的配置。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需要配置更多的劳动。这些劳动从何处来？尽管斯密时代的城乡都存在着剩余劳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却没有“剩余劳动”的概念，他把人口增长看作是添加劳动的主要泉源。

关于经济发展的过程，斯密认为有三种可能出现的状态。一是进步状态。斯密以当时的北美为例说明处于进步状态的经济。一是退步状态，斯密以当时的孟加拉为例说明处于退步状态的经济。按照斯密的分析，发展过程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从均衡状态开始，任何一个向上的或向下的移动力量，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循环变动。这种循环变动有没有限度呢？斯密的看法是：自然的上限是静止状态，经济增长不能永远地持续下去。由于资本不断积累，利润率将降到最低值，经济将步入静止状态。斯密对静止状态作了如下的描述：一国所获的财富，已达到它的土壤、气候和相对于他国而言的位置所允许获得的限度，因而没有再进步的可能，于是它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也许都非常的低，一国人口的繁殖，已达到其领土所能维持或其资本所能雇用的限度，于是职业上的竞争非常激烈，使劳动工资低落到仅足以维持现有劳动者人数，而且由于人口已经非常稠密，也不可能再有增加；一国的资本，与国内各种必须经营的行业或所需要的资本相比，已经达到饱和程度，于是各行业所使用的资本，

就达到了各行业性质和范围所允许使用的程度，从而各地方的竞争大到无可再大，而普通利润小到无可再小。

当代发展经济学家不认为斯密所谓的静止状态即意味着不发达。在静止状态之下，不再有增长，按人平均产出停滞不前，工资处于糊口水平，利润低到只能抵偿风险，净投资缺少，人口和总收入保持不动。而这种停滞状态，照斯密看来是无可挽救的，因为经济已达到了自然环境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这种情况不符合今日发展经济学中“不发达”的定义。而且也和斯密自己“不发达”概念不同。斯密所谓不发达，指在达到自然资源所能容许的最大限度之前，经济已出现停滞不前的情况。

由上面对斯密论点的剖析可以了解：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是资本形成率。斯密这个重要思想，为当代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纳克斯、罗森斯坦——罗丹和罗斯托等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说法（称为“资本根本主义”）打下理论基础。

在分析资本时，斯密还说资本应该包括“所有居民既得的有用能力。”当代发展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就是他们习用的人力资本概念的起源。

2. 李加图

李加图不同于斯密之处，在于他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他在致马尔萨斯的一封信中，声称：“你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财富起因的性质的，我则认为它应该是研究生产物在参与生产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分配的。人们不可能制定有关数量的法则，但可能制定相当正确的有关比例的法则。前一个问题的研究是虚妄的。后一问题的研究则是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⑪尽管如此，李加图所探究的分配问题却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去观察的。各个投入要素的收益随着时间推移的变化，这就必然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而李加图在十分强调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时，又不得不重视生产在实际价值上的增减。他说：“我们集中注意力研究的重大问题是谷物、劳动力和实际价值的商品。……扩大实际价值转换为货币价格的影响也许出于好奇心，但人类真正的兴趣在于使劳动力富有生产性、享受丰余和由资本与产业所得产品的良好分配。”^⑫

和斯密一样，李加图不考虑技术进步。按照他的逻辑，随着人口增长，农业生产将同时向集约和粗放的耕种边际推进。由于报酬递减，每增产一单位谷物所需的劳动将递增。而工业产品所需劳动不变，谷物相对价格必然上涨，于是国内贸易条件不利于工业。就劳动而言，有“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前者由工人仅足糊口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后者由劳动供求情况决定。资本量制约着劳动需求，人口量制约着劳动供给，如果工资超过劳动的“自然价格”，人口的增长率将超过资本增长率，从而劳动“市场价格”将回到“自然价格”水平。就实物意义而言，劳动的“自然价格”是不会变的，但谷物相对价格的上涨，引起了货币工资的提高，于是出现了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李加图粮食狭口现象”，发展经济学家们还认为这种现象也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李加图分析过的工农业贸易条件也是当代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中心问题。

此外，李加图的比较成本学说，在发展经济学中形成了如何利用国外资源促进国内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

总之，当代发展经济学家们，按照他们的理解，对古典学派的思想一方面感到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典学派未能预见非殖民地化的进程、国际贸易总量和格局的变化等等。又例如古典学派低估了技术进步、夸大了“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另方面又十分肯定古典学派经济思想对他们启示很多，古典学派提出过的有关经济发展的八个问题，

仍然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1) 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和人口增长与粮食供应相对比例；(2) 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作为城市粮食供给来源地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农业的作用；(3) 部门间贸易条件的重要性和贸易条件趋于对农业有利从而窒息工业发展的可能性；(4) 制约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国民收入职能分配的长期趋势的力量；(5) 利润转化为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6) 资本如何在各个部门间作到最优配置；(7) 国际贸易对国内增长的贡献；(8) 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四 古典学派以后涉及发展问题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

随着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日益显露和发展，李加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逐渐失去古典学派的色泽，而向为资本主义辩护、解释的庸俗方向发展。此后，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前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影响最大的，是萨伊理论、马尔萨斯学说和奥国学派理论。

萨伊取消了古典学派关于劳动价值说的积极论证，把劳动、资本和自然平列为生产的三要素；马尔萨斯搬用了“土地收益递减规律”作为自己理论根据，把资本主义的相对人口过剩现象说成是普遍的人口规律；奥国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为核心，建立一套主观唯心、超越时空的理论体系。他们这些基本观点和分析方法，或者给当代经济发展理论打下深刻烙印，或者为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全部承袭。

约·斯·穆勒于1848年出版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书一直到1900年都是英美两国的经济学标准教科书。它是当时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说的系统综合。但是，穆勒对经济增长问题，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看法。在《原理》第四和第五两章，他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他把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逐个地作为变化条件来观察对投入要素价格起落的作用，这是当代发展经济学学习用的分析方法。

约·斯·穆勒也探索了静止状态的问题，但他所谓的静止状态具有不同的含义。照他看来，当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把发展推向高水平阶段时，由于人口增长的约束，经济上出现了静止状态。因此，他的静止状态的概念含有乐观的、欢快的色彩，这可能是由于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一度有持续增长的缘故，在《原理》第四章中，穆勒明白地指出：一个高发展水平的静止状态，比任何其他状态令人高兴。他还说，为了追求发展，人们互相倾轧、低醉沉迷是不符合“道德规范和政治哲学”的，这种观点和当代发展经济学中的“反增长论”的基调颇为相似。

1850年后，在资产阶级经济思潮的主流中，关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理论差不多消失了一百年，其原因是：

第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矛盾的出现与激化转移了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注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忙于对资本主义经济病态——周期波动、分配不均等作庸俗的辩护和解释，而对经济增长和发展问题，则沉默不言。

第二、在这一时期，唯一处于迅速资本主义化和快速增长与发展的国家是日本，但日本经济发展状况还没有人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的框架中作出分析研究。

第三、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还处于殖民地和附属国地位，谈不到经济发展问题。

在经济发展理论销声匿迹的一百年中，有两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许算是例外。

一个是马歇尔，由于他的学说是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第二次大综合，他对经济发展问题不免有所论述。他不只注意到现实资源的配置，而更注意到资本累积的来源和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他还认为工业方面的报酬递增趋势将会压倒农业方面的报酬递减趋势。马歇尔对经济

发展理论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发展的几个基本观点：

(1) 经济发展是渐进的、连续的、平稳的过程。他说过：“自然从不乐意飞跃”这个公理，特别适用于经济发展。经济变化不是突然的，而是通过边际调节来推进的。边际调节反映在价格机构上，从而价格机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好机制。静态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就足以用来研究经济发展。

(2) 经济发展过程是和谐的、累积的，是以自动均衡机制为基础的，从而在发展过程中，冲突中会出现秩序，自私角逐中会出现和谐。自动均衡机制会保证各个收入群体从经济发展中普遍得益。

(3) 经济继续增长是可能的，经济发展的利益是会自动地、逐步地扩散分润的。

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并大大地加强了它们的庸俗性质。例如，当代经济发展学家一般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横向的“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纵向的“涓流效应”(trickling-down effect)。这两种效应将自然而然地促使经济发展所得到的利益，普及到广大的社会各个阶层。

另一个是熊彼得。他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格局(静态的循环周流)的一种突破。突破力量来自企业家的“创新”。“创新”的不断出现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他认为“创新”是一个“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的一种变动，从而比较强调了内因的作用。当然，熊彼得理论是以具有发达金融体系的工业化国家而不是以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的。

五 结 语

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主要是由西方经济学家溯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既往经验、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理论。客观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观上，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是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他们的理论，可从古典学派及古典学派以前的经济思想溯其源流，但古典学派以后的形形色色庸俗经济思想，给他们的理论影响更深。因此，当代发展经济学具有十分明显的庸俗性质，失去了古典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较深的洞察力和较广的视野，正如一个著名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所说：“现代经济学与日俱增的狭隘而技术化的性质，使我们有所得也有所失。古典学派作者们的写作接近实际。他们对经济过程有丰富的知识，他们毫不犹豫地谈论人口学、心理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他们询问的是要走多远才达到问题的边界，而不耽心在越过他们理论边界之前能走多远。我们在这方面和其它方面都仍然可以学习他们。”^⑩

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问题。作出最科学、最完整分析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问题的剖析，深入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本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时期宗主国和殖民地与附属国关系的揭示，仍然是研究当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关系的准则。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去批判当代发展经济学的庸俗性，是有兴趣于研究当代发展经济学的人们的重大任务。

从另一方面看，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社会基础和今日的经济特征，和我们有类似之处。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所走的道路和我们不同，它们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有不少值得我们借鉴，而以那些经验教训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理论，虽然在体系上属于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探讨，对我们来说，还不是毫无价值的。(下转 84 页)

联合召开的 Warrenton 会议之后建立的国家图书馆与情报科学委员会,是推进图书馆合作网络的常设协调机构。它负责研制图书馆与情报服务的全国计划工作,和提出相应的建议。无疑,这种协调作用对于发展图书馆自动化是很必要的。

美国图书馆协会和情报科学学会,在自动化中作了许多提倡、支持、促进的工作,特别是在有关自动化的学术交流、培养人材、推进标准化、争取社会公众的支持等方面是很有成效的。

第三,图书馆的自动化促进图书馆的网络化,而只有网络化才能充分发挥自动化的效益。

计算机、电信等技术为现代图书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它不仅速度快、效率高、适用于大批量作业,而且打破了图书馆之间地理上的障碍,可以使千百个图书馆紧密联系、息息相通。这就促进了现代图书馆网络的形成与发展。技术上的自动化和组织上的网络化,两者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

美国的情况表明,以计算机为基础的现代图书馆网络,能使大中小型图书馆都有机会参加到自动化行列中来,实行设备共享与资源共享,并有利于促进图书馆工作的标准化。没有必要每个图书馆都自成系统。这从整个社会来看,是一个很大的节约。

当然,美国图书馆的网络化并没有消除

竞争。不少平行的网络之间竞争激烈。全国性的图书馆自动化总体规划,在英国这种社会制度下是不可能的。

第四、使图书馆员具备新的知识与技能,改变馆员的素质,是实行图书馆自动化的必要条件。

美国的情况表明,图书馆员对于自动化的认识与适应能力,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人力资源是自动化系统的基础。

馆员对自动化的认识水平与接受能力,取决于他们普遍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这种水平是同一个国家的整个科学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图书馆自动化不仅需要经济、技术方面的基础,也需要文化方面的基础。

提高馆员素质的措施,包括创造再学习的条件与机会,把操作自动化系统的技能明确列入馆员职责,增加数学、计算机、自动化等方面的人才到图书馆战线上来,这些都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

参 考 文 献

① The Professional Librarian's Reader in Library Automation and Technology. 1980

② Jesse H. Shera: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 1976

③ Jean Key Gates: Introduction to Librarianship. 1976

(上接 26 页)

注释:

①④⑬ L. G. Reynolds: Image and Re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第 34、5、33 页。

② 如 I. Adelman: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③ 如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⑤ 罗斯托:《经济成长的阶段》第 10 页。

⑥ 同上书,第二章。

⑦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 2 页。

⑧ 彼·弗·杜拉克:《走向下一阶段的经济学》,转引自《经济译从》1981 年,第 11 期,第 65 页。

⑨⑩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序论及全书设计》。

⑪⑫ Ricardo's Works, 第 8 卷第 278 页,第 9 卷第 83 页。